

# 从趣味分析到阶级构建： 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

刘 晖

内容提要 布尔迪厄在对法国 1960 - 1970 年代日常生活方式的社会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基础上，揭示出趣味的产生根源和社会用途。他以（习性）（资本）+ 场 = 实践这个生成结构主义公式，把趣味从审美维度扩展到社会维度，把康德建立的“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的对立合并到“自由趣味”与“必然趣味”的对立范畴中，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进行社会批判，提出趣味的区分功能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补充了分类斗争的维度，创立了文化社会学的阶级理论。趣味分析显示出布尔迪厄将美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总体社会学抱负以及对异化问题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 区分 场 习性 资本 趣味

布尔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自 1979 年问世便成为争论焦点。通过社会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布尔迪厄颠覆了“趣味与颜色无法讨论”的定见，触动了人们的存在和被感知的存在的最深层，阐释了趣味的社会成因和阶级性质。就这部被频繁引用的社会学著作，N. 恩尼克评价说“这种区分社会学开始时是悖论式的和反传统的，今天已经成功地变成一种共识性的参照。”<sup>①</sup>

法语“distinction”一词含义丰富，除“区分”之外，还有“高雅”、“卓越”、

---

<sup>①</sup> N. Heinich, *La sociologie de l'art*,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1, p. 50.

“优异”等等。在布尔迪厄看来,“区分”几乎不是基于明确的意识 (conscience),而是基于习性的无意识 (l' inconscient)。作为习性的判断力维度,趣味具有无意识的区分功能。由此,布尔迪厄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进行了社会批判,把康德所说的“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的对立合并到“自由趣味”与“必然趣味”的对立范畴中,提出趣味的区分功能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创立了文化社会学的阶级划分标准和阶级斗争概念。

在与趣味和艺术密切相关的《区分》中,布尔迪厄几乎未论及哲学的或文学的美学传统。在他看来,学院美学不重视趣味产生的社会条件,他的文化社会学要弥补这种缺失。在学院美学的谱系中,趣味 (goût) 来自拉丁词 Gustus,意为品尝或味道。作为“判断能力”的现代趣味概念始于十八世纪,味觉只充当审美趣味的比喻,突出其无概念、无准则的特征,比如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强调趣味是一种不经思考的辨别“这是一种灵敏的分辨,如同舌头和味觉的分辨,并如它们一样抢在思考前面,通常也像它们一样是不确定的和分散的。”<sup>①</sup>此后趣味基本上局限在审美范畴。

我们可以在美学传统中找出与布尔迪厄的审美趣味批判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趣味的生成。休谟代表的经验论与康德代表的先验论对立。休谟从人类感觉的纯粹经验性出发,认为由于每个人气质不同,时代和国家的风俗和观念不同,趣味很难统一,所以趣味需要培养,判断力在训练中得到提高。<sup>②</sup>与休谟不同,康德则强调趣味具有经验法则无法达到的先天原则“鉴赏判断必定具有一条主观原则,这条原则是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却可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的、什么是令人讨厌的。”<sup>③</sup>趣味是不由概念和客观性的原则决定的人类共通感。这就是说,鉴赏判断是主观的,但具有普遍价值。

第二,关于趣味与天才的关系。康德认为鉴赏力可驯化并引导天才,但天才可自由地摆脱艺术规则的束缚并创造新的规则(详见《判》:163-165)。按照舍费尔的观点,康德的趣味判断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康德认为自然美胜过人工美,自然美不让人想到任何最终意图而引起纯粹的审美经验,人工产品则受制于某种具体目的,所以艺术领域中无法进行纯粹审美判断。接下来康德又以天地理

① J.-B. Barrère, *L' idée de goût*, Paris: Klincksieck, 1972, p. 18.

② 详见休谟《休谟论说文集·论道德与文学》,马万利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③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论废除了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区别，取消了艺术产品的意图性，天才的作品被归入自然美的范畴。由此，趣味负责纯粹美学的接受，而天才负责纯粹美学的生产。最后，他又主张艺术作品是趣味与天才的结合：天才负责内容，相当于想象力，智性趣味负责形式，与理解力相联系。由此，纯粹趣味判断在艺术中消失了。天才占据了纯粹趣味判断以往占据的位置，而趣味则被打发到意图性的领域。这种悖论源于康德在纯粹接受美学与带有意图结构的艺术理论（概念判断）之间建立的绝对对立。<sup>①</sup>

这种“智性趣味”在法国被等同于束缚创造力的古典主义陈规和宫廷趣味，遭到浪漫派的抵制，德·斯太尔夫人以天才反对法国人的社交趣味“文学上的趣味就像社交中的分寸得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见证，说明财富，门第，或至少同这两者有关的习惯。而天才却不同，它也可以产生在一个与上流社会素无瓜葛的手工匠人的头脑里。在一切讲究虚荣的国家，都把趣味放在首要地位，因为它区分各个不同的阶级，它是头等阶级一切成员之间联络的标志。”<sup>②</sup> 批评家圣伯夫则强调趣味的先天和后天的性质“趣味是一种天赋，像所有的天赋一样，尤其是艺术的天赋；这是被训练培育、被实践刺激的一种特殊感觉。”<sup>③</sup> 我们看到，除了德·斯太尔夫人稍稍触及趣味的阶级性，趣味产生的社会条件是不被讨论的。

毫无疑问，关于趣味的系统社会学研究始于布尔迪厄。他要恢复趣味的完整定义：趣味既是用来辨认食物味道的感官，即味觉，也是审美趣味（鉴赏力）。他像圣伯夫一样中和经验论和先验论，强调趣味是受后天经验影响的无概念的先天认识模式。更进一步地，他把趣味研究从审美领域扩展到社会实践，创造性地以习性概念统摄康德的审美趣味（判断力）与天才（创造力），把习性确立为认识和实践的基本模式，“习性既是客观上可分类的实践的生成原则，也是这些实践的分类系统（划分原则）”<sup>④</sup>。

尽管传统美学不论及趣味的社会可能性条件，但需要指出，西方哲学中的异化问题与审美的社会性密不可分，布尔迪厄本人在异化问题上与他们进行了或明或暗的对话。比如，席勒提出了完美的人的理想，主张通过审美教育，让艺术战

① 详见舍费尔《现代艺术》，生安锋、宋丽丽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0-83页。

② 德·斯太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丁世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③ C. A. Sainte-Beuve, *Port-Royal*, tome I, Paris: Gallimard, 1952, p. 571.

④ P.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Paris, Minuit, 1979, p. 190.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胜自然（或本性），在尽可能的和谐之中培养人的感性和精神的整体。黑格尔把“文化”概念从席勒的审美意义转到日常的或人类学的意义上，强调在实践领域而非审美判断中，主体与客体才能达成一致，并试图以家庭、阶级的调和促使个体与社会的融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以抽象的思辨消除异化，强调感性与精神、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异化根源在于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应该通过社会革命消除异化，实现席勒的完整的人的理想。卢卡奇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物化理论，指出人制造的物变成了一种与人分离的、异己的力量，主客体的分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从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sup>①</sup>。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审美克服异化，他从身体对事物的体验出发，关注日常生活世界，把审美变成了与世界的联系方式，把世界当成了艺术品，一种纯粹的自我生成游戏。<sup>②</sup> 存在被审美化了，无关政治与伦理。不干预事物存在的无为不会导致人的选择、行动和思辨。萨特反对这种宿命论，他看到物质的活跃的、异化的力量，但他坚持认为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者，集体的或个人的历史行动者能够发挥意识的首创作用，推动整个社会或阶级摆脱实践惰性。

我们看到，异化问题是美学与政治、伦理密不可分的问题，不存在无社会生成的纯粹美学和审美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把美学描绘为非美学也许更准确”<sup>③</sup>。倘若以美拯救世界的幻想是虚幻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望的那样，让被剥夺的多数人享有文学和艺术权利，充分实现他们潜在的自我？与马克思寄希望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发展不同，萨特强调人的存在既是物质的，也是被感知的，并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客观化和异化，异化在于“匮乏、加工物对人类关系的深刻渗透”，异化通过物质的中介折磨人，“由物质匮乏所构成的实践领域将人分解成孤立的存在，在其中他们在他性的不同程度上互相呈现”。<sup>④</sup> 这就是说，物质生活条件、人们关于这种条件的表象把人们区分开来，控制人与人的关系，这与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直接相关。

受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启发，布尔迪厄认为，如同宗教一样，人们关于社会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8页。

② 详见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③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第177页。

④ 详见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0、261页。

世界的表象不是臆想的，不是虚假的，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但他不赞同涂尔干把社会事实看作物，把体验客观限制的主观方式当成偏见、观念、虚假意识从社会分析中剔除，而提出把表象纳入到分析中。他也不同意萨特把表象当成主体之间的抽象的、普遍的客观化，一般的异化，因为只有统治者拥有规定表象的社会权力，被统治者则默认统治者强加的表象。由此，布尔迪厄提出（习性）（资本）+场=实践的社会学总体理论，揭示社会（艺术）实践和（审美）表象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阶级构建的原则。在他看来，科学社会学既反对理性主义的不自量力的说教，也反对唯美主义者的虚无主义，它的使命是通过对抗常识和智识定见揭露真相，为争取自由的政治行动提供理性手段。<sup>①</sup> 趣味的社会批判显示出布尔迪厄将美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抱负。

## 一、自由趣味与必然趣味

如邓晓芒所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目的是消除《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造成的自然与自由的分裂和对立，在卢梭的影响下，康德通过判断力批判暗中追问“人是什么”这个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判断力指反思判断力，即为给定的特殊性寻找普遍性，它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起作用。按照康德的逻辑，鉴赏判断是不带概念地针对自然对象的自由活动，它产生愉快的人类共通感；天才艺术家似乎无目的地、绝对自由地创造，其作品显得像是大自然的产品，同时体现了创造者的概念和理想并成为“道德的象征”，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就符合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自然界和道德界、必然和自由达到了一种主观形式上的统一。<sup>②</sup> 康德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是“人是通过审美经验意识到自己的普遍性自由的存在。”（《判》：396）这就是说，康德把审美和艺术活动视为人类解决必然与自由的对立的手段，判断力为“人是什么”所定义，用布尔迪厄的话说，“‘纯粹’愉快则注定倾向于变成一种道德至善的象征和一种升华能力的标准，这种升华能力规定了真正有人性的人”（*Distinction*：VII）。

那么，判断力是天生的、普遍的吗？每个人都能通过审美得到自然与自由的和谐统一吗？布尔迪厄在康德创立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中，对其判断力进行社会批判，揭示趣味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区分功能：作为一种高度升华的利益形式，趣

<sup>①</sup> See P. Bourdieu, dir., *Post-scriptum, La misère du mond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3, p. 1444.

<sup>②</sup> 详见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27页。

味将不同阶级持有的资本总量和结构内在化, 决定了人们关于社会世界的观点, 或更确切地说, 显示了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因为趣味是一个人的全部所有即人和物的原则, 是一个人对别人而言的全部所是的原则, 是一个人借以给自己分类并被分类的东西的原则。” ( *Distinction* : 59) 由此, 布尔迪厄揭示出康德的“人是什么”的社会条件, 将审美批判扩展到政治批判的范围, 揭示在审美经验上的(卢梭式)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康德把感性判断分为经验性的和纯粹的 “前者是感官判断(质料的感性判断), 唯有后者(作为形式的感性判断) 是真正的鉴赏判断。” (《判》: 59) 纯粹鉴赏判断 “只是这样一种不借助于概念而在愉悦方面的普遍同意; 因而是能够被看作同时对每个人有效的某种审美判断的可能性” (《判》: 51)。纯粹鉴赏判断 “是一个不受刺激和激动的任何影响(不管它们与美的愉悦是否能结合)、因而只以形式的合目的性作为规定根据的鉴赏判断”, 而 “当它为了愉悦而需要混有刺激和激动时, 甚至将这作为自己赞赏的尺度时, 它就永远还是野蛮的” (《判》: 58, 59)。这意味着, 康德的美是无概念地普遍地令人愉悦的东西, 它只关乎形式, 快适和善的介入都会妨害美的纯粹性。

布尔迪厄承认鉴赏判断的无概念性, 但他质疑鉴赏判断是普遍有效的, 他试图确定在何种社会条件下, 这种体验以及有此体验的艺术爱好者或 “有趣味的人” 是可能的。也就是说, 他把康德的 “纯粹趣味” 与 “野蛮趣味” 的区别还原为判断主体之间的区别, 突出审美人与普通人的修养差别的社会根源。由此, 纯粹鉴赏判断与感官判断的对立就是有教养的人的审美判断与大众审美判断的对立, 以及相应地, 形式与功能的对立 “康德巧妙地将 ‘令人愉快的’ 与 ‘给人满足的’ 区分开来, 以及更普遍地, 将 ‘无关利害’ 即静观美学的特有品质的唯一保证与决定 ‘快适’ 的 ‘感官趣味’, 与决定 ‘善’ 的 ‘理性趣味’ 区别开来, 而民众阶级成员则期待一切形象完成一种功能, 哪怕是符号的功能, 在他们的所有判断中表现出对道德或快适的规则常常明确的参照。” ( *Distinction* : 42-43) 康德的纯粹鉴赏判断(趣味) 是有教养的习性, 合法的艺术认识方式, 即审美配置 “审美配置作为一种能力, 它不仅从作品本身并且为作品本身, 从作品的形式而非功能来考察被指定要如此领会的艺术作品, 也就是合法的艺术作品, 而且考察世界上的所有事物, 无论是尚未被承认的文化作品——比如, 一个时期内的原始艺术, 或今天的大众摄影或拙劣艺术品——抑或自然物。” ( *Distinction* : IV)

在艺术作品面前，不存在天真的目光。艺术作品只对掌握其编码方式的人产生意义和旨趣。通过长期的熟习或系统的训练，审美人超越了最初的概念阶段，获得了精湛技艺，能把作品看作以自身为目的的能指。所以，尽管审美判断是人为努力的产物，却产生了抹去学习痕迹的超凡魅力表象。大众缺乏训练，无法脱离概念，无法获得认识和辨认特定风格特征的能力，他们倾向于实用的和功能主义的“审美”，拒绝形式练习和为艺术而艺术。他们以感性的、信息的或道德的兴趣为鉴赏原则，他们的自在美学是精神气质的一个维度，不遵守自为美学的特定逻辑。这是由于大众受物质生活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审美配置，因为“审美配置依赖过去和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无论是否得到学校教育承认的）一种文化资本的积累，物质生活条件既是审美配置的形成条件也是它的使用条件，而这种文化资本只有付出一种脱离经济必然的代价才能获得”（*Distinction*：56）。

具体而言，审美配置是教育的产物，离不开一定的习得条件——闲暇和训练“作为遏制日常急需且搁置实践目的的普遍化能力，作为无实践功能的一种持久的实践倾向和才能，审美配置只有在一种脱离迫切需要的关于世界的体验中且在本身就有其目的的活动如学校训练或对艺术作品的静观中才能形成。”（*Distinction*：57）除了与习性相关，“纯粹的”目光也与一个相对自主的艺术生产场的出现有关“审美判断的社会范畴只有以高度升华的范畴的形式，才能在康德本人及其读者身上起作用，这些高度升华的范畴，诸如美与魅力、愉快与享乐或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立这类委婉措辞，允许通过一种符合一个特定场的表达规则的形式，表现并体会社会对立，但这不意味着任何有意识的掩盖意图。”（*Distinction*：577）在场的中介作用下，审美主体的社会利益和冲动被形式化遮蔽了，审美卓越掩盖了社会差别。所以，康德的纯粹鉴赏判断属于康德之类的有教养的“少数幸福的人”，表达了他们的特定审美经验。与无教养的多数人不同，他们能够为了形式而抛弃被表现对象的性质和功能，驱除一切“天真的”反应，也就是纯粹伦理的态度——在令人厌恶的东西面前表现厌恶，在令人渴望的东西面前表现渴望，在神圣的东西面前表现虔敬。

布尔迪厄通过摄影调查看到，文化资本富有的人（高等阶级）认为任何对象都能拍出漂亮的照片来，照片的美不在于拍摄的内容，而在于拍摄的方式。而文化资本缺乏的人（民众）则把公认为美的对象如落日、民间舞蹈或名画等当作“好看”、“漂亮”、“可爱”（而不是“美”）。他们无视方法或风格，认为美在美丽事物的形象中，甚至在美丽事物的美丽形象中。他们往往根据照片传达的

信息, 根据其可读性也就是意图或功能来衡量其价值。所以, 纯粹的形式探索比如先锋派戏剧、非具象绘画和古典音乐, 让他们感到困惑, 阻碍了他们与美的人或物直接交流, 他们无法理解这些符号的意味。

可见, 纯粹审美判断要求审美主体具备特定的审美配置, 特定的文化资本, 保证文化资本积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并处在有特定规则的艺术场中。这就是纯粹鉴赏判断(纯粹趣味)的社会条件。由此, 审美配置起到了区分作用“如同任何一种趣味, 审美配置起聚集和分隔作用: 作为与生活条件的一个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 它将所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 但把他们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隔。”(*Distinction*: 59) 所以, 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并不是普遍的, 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 资产阶级的纯粹艺术作为与物质世界对立的自由世界, “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底层人民, 以及存在于这些阶层之中的真实的普遍性, 艺术从虚假普遍性的目标中得到了自由”<sup>①</sup>。

由于趣味属于感知范畴, 是微妙的、不可言喻的, 它很容易造成天赋的假象“趣味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品味和口味), 通常用来证明自发生成的幻想的合法性, 这种有教养的配置倾向于借天生配置的外表显现出来。”(*Distinction*: 109) 布尔迪厄判断力批判的革命性在于揭露统治阶级的审美配置以统治阶级暗中垄断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审美配置象征地显示阶级之间的差别并把这些差别合法化, 掩盖这些差别的非象征基础。对文化贫困的阶级而言, 谈不上审美配置或纯粹鉴赏趣味, 他们的趣味更多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必然选择, 只能归入感官趣味或理智趣味。为了考察所有阶级的趣味, 布尔迪厄把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的对立合并到必然趣味与自由趣味的对立之中, 把趣味从艺术延伸到日常生活选择和生活艺术进行考察。他给出了趣味的社会学定义“趣味, 即一个确定的阶级占有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客体和实践的(物质的和/或象征的)倾向和配置。”(*Distinction*: 193) 由此, 趣味是一种阶级习性, 表明一个阶级倾向于喜欢什么东西或喜欢做什么事情。

趣味的阶级性是由其社会生成条件决定的。通过社会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 布尔迪厄得出: 趣味与习性的生成方式是相同的, 包括家庭灌输、学校教育和社会轨迹的作用。原始训练对趣味的生成至关重要。原始趣味, 以及人们与文化的

---

①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151页。



关系，在出生世界中形成。一方面，作为各种趣味的原型，口味代表最原初和最深刻的经验，决定了对苦/甜、美味/无味、热/冷、粗俗/雅致、严肃/快乐的体验。这种趣味在家具、服装或菜肴等日常选择中非常明显，因为它依赖与学校教育无关的早期训练，受社会出身影响最大。在食物消费上，必然趣味与自由（奢侈）趣味的对立表现为数量与质量、暴食与小饌、实质与形式或外形之间的对立。与民众阶级“大吃大喝”不同，资产阶级把吃饭视为社会仪式，视为伦理举止和美学雅致的标志，这无非为了抛弃动物本性、原始需要，否定消费的原始意义和功能，否认消费行为和被消费物的物质现实，否认民众的物质主义粗俗。另一方面，作为狭义的文化趣味，品味受学校教育的影响比社会出身更大。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按照文化实践被学校教育系统认可和传授的程度而变化，社会出身的影响在学校不教的“自由文化”或先锋文化方面非常大。文化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在每种艺术内部，与社会认可的体裁、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这就使得趣味预先具有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起作用的倾向”（*Distinction*：II）。从学校或家庭或早或迟地获得文化的方式决定了文化素质的高低。出身于统治阶级（贵族或大资产阶级）的人从小接受合法文化的训练，他们与文化的关系“并非借助话语，而是通过很早进入一个有修养的人、实践和物的世界而形成”（*Distinction*：81）。他们不知不觉中培养的文化习性，遮蔽了获得过程的人为特征。所以统治阶级是在文化上得天独厚的阶级，其他阶级望尘莫及。

“什么是文化”对趣味分析至关重要。我们看到，布尔迪厄采用人种学家的方法，以广义的“文化”涵盖狭义的“文化”，对文化提出了自己的阐释。雷蒙德·威廉斯区分过文化的三个层面：一是某个特定时代和地方的活文化，二是某个时期被记录下来的包括艺术和日常事务的文化，三是选择性传统的文化，它是连结前两者的因子，因为它在第一个层面上创造了普遍的人类文化，在第二个层面上留下了某个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sup>①</sup>但威廉斯强调，“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选择会受到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许多特殊利益的制约”<sup>②</sup>。应该说，布尔迪厄的“文化”定义包含了威廉斯的三个层面。像威廉斯一样，布尔迪厄也反对文化的本质主义观念，威廉斯的“选择性传统的文化”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合法文化。

---

① 详见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②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第60页。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①</sup>那么,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吗? 布尔迪厄只是有保留地同意这一点。<sup>②</sup>通过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强调合法文化定义的动态特征。文化不是静态的知识库, 而是人们在一个既定时刻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定义进行斗争的赌注和临时成果。文化资本与学校传授和家庭传承的智力资质相关, 包括有教养的习性、文化财产、学历等。在《再生产》中, 布尔迪厄指出, 学校教育文化不是一种中立文化, 而是一种阶级文化。学校教育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理性化, 只有彻底掌握学校教育文化, 才能获得无学究气的自由文化。但学校把自由文化视作终极价值, 贬低最有学校教育特点的价值, 比如卖弄学问, 而抬高自然的态度, 欣赏令人愉悦的谈话艺术和高雅举止。这种文化不是知识, 而是对文化的态度, 与文化的关系, 属于文化习性。所以教育行动符合统治阶级的客观利益, 有助于阶级之间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我们看到, 布尔迪厄与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似乎有某种契合: 知识可充当权力意志的工具, 知识的传授遵循统治策略, 使人和世界被更好地统治。但必须强调, 布尔迪厄没有走向福柯的文化相对论, 把文化当作纯粹的阶级统治工具。他受涂尔干教育理论的启发, 认为教育系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能够保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一种文化。不过, 在他看来, 涂尔干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的接受条件被统治阶级垄断, 尤其这种文化常常被简化为与文化的关系, 这种关系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教育保守主义: “教育工作, 总具有保持秩序, 即再生产各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结构的功能。因为不管通过灌输还是排除, 它都有助于把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合法性的承认强加给被统治集团或阶级的成员, 并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内化约束和检查。只有当这些约束和检查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我检查的形式时, 它们才如此出色地为统治集团或阶级的物质或象征利益服务。”<sup>③</sup>教育致使被统治阶级默认合法文化的标准。这样看来, 如果被统治阶级屈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那么为了合法文化的定义的象征斗争就只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 作为被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与作为统治阶层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对抗。小资产阶级有追随资产阶级的良好文化意愿, 他们把文化当成通过学校或自学得来的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98页。

② 详见布尔迪厄、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 马胜利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39页。

③ 布尔迪厄《再生产》, 邢克超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第50-51页。

知识，对文化过分严肃，不具备资产阶级浑然天成的文化习性。民众阶级只是以被动的标志或陪衬物的身份加入象征斗争，他们无法对合法文化产生疑问，深感在文化上无资格。应该说，布尔迪厄提出的习性概念为文化批判提供了更大的解释力量，揭露了“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之间的对立真相——人们与世界、与世界的物质束缚之间存在客观和主观距离，被统治阶级无力克服必然与自由的分裂以消除异化。

## 二、分类与阶级

如果康德的纯粹鉴赏趣味不是所有人共享的，那么它不是将必然与自由统一的普遍有效手段。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消除异化的有效武器吗？布尔迪厄看到异化的根源不止在于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还有习性。毫无疑问，布尔迪厄的阶级理论离不开马克思的遗产。他承认，只有在马克思之后，在马克思提出创立政党、按照阶级斗争理论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之后，才谈得上阶级和阶级斗争。<sup>①</sup> 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充当劳动力的无产阶级与榨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的矛盾，他的逻辑很清楚：阶级关系是对抗性的，对抗性来源于剥削，而剥削是基于生产关系的。

布尔迪厄指出这种阶级两分法的不足：一、唯经济主义，即仅仅参照经济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解释社会位置，把社会世界当成由两大群体组成的一维世界，把社会世界的对立简化为两大阶级的对抗，把社会关系简化为生产关系。二、为了进行阶级动员，把阶级分为基于客观条件的“自在的阶级”与基于主观因素的“自为的阶级”，并把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变当成一种真正的质变，因而这种阶级转换逻辑要么是决定论的，把过渡视为逻辑的必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作用和客观条件成熟的结果；要么是唯意志论的，把过渡视为由政党领导实现的理论“觉悟”，这种过分简化的跳跃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为了发展阶级理论，布尔迪厄主张实施一系列决裂——与重视实体不顾关系的理论决裂，实体指的是真实群体，有人企图确定这些群体的数量、界限、成员等；与唯智主义幻想决裂，这种幻想把学者构建的理论阶级视为一个实际上被动员的群体；与经济主义决裂，经济主义导致把社会场即多维空间约简为唯一的经

---

<sup>①</sup> See P. Bourdieu,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 économie des échanges symboliques*, Paris: Fayard, 1982, pp. 157 - 161.

济场, 约简为因此变成社会位置的坐标的经济生产关系; 最后与客观主义决裂, 客观主义与唯智主义相伴而生, 它导致忽视象征斗争, 象征斗争以不同的场为地点, 以关于社会世界的表象尤其是每个场内部和不同场之间的等级为赌注。”<sup>①</sup>我们将会看到, 这些决裂包含了布尔迪厄的阶级划分原则。

布尔迪厄通过社会空间理论对阶级进行了重构。他强调阶级是在社会空间中人为地构建的“阶级在这个空间中在某种程度上以潜在的状态分散地存在, 不是作为一个已知条件, 而是作为某种需要构造的东西存在。”<sup>②</sup>与被建构的社会一维空间不同, “社会空间是一个多维空间, 即诸多相对自主的场构成的开放总体, 相对自主就是说在运行和变化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服从经济生产场: 在每个次空间内部, 统治地位的占据者和被统治地位的占据者不断地投入到不同形式的斗争中(但不一定因此就构成互相对抗的群体)”<sup>③</sup>。在这个多维空间中, 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获得了不同于之前的阶级理论的功能, 前者化为各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 后者化为各种场, 其中经济资本和经济生产场占主导的但并非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物质生产之外, 布尔迪厄还考虑文化生产、消费和习性(趣味)。习性至关重要,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核心——阶级斗争和阶级动员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有了不同含义。习性部分地受益于韦伯的文化主义社会理论。韦伯承认马克思的阶级分类可以把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位置与其生活机会分布的不平等联系起来, 但他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没有包括群体形成的全部条件, 忽略了观念对群体的影响“同这种经济决定的‘阶级状况’相反, 我们想用地位状况来表示人们的生活命运的所有典型因素, 即由一种专门的、肯定的或否定的社会荣誉估价所决定的因素……就内涵而言, 身份荣誉通常表现为, 所有该群体的成员均会有如其所期待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地位的分层与对思想和物质财富或机会的垄断相辅相成。某种身份荣誉总是凭借着保持距离和排他来维持。”<sup>④</sup>韦伯强调地位身份以荣誉而非财富为合法基础, 视观念为群体凝聚的保证, 区分群体的手段, 垄断经济机会的条件。布尔迪厄深受韦伯的观念(或精神气质)的启发, 强调仅靠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位置)并不能形成阶级“社会阶级不只是由生产关

---

① P. Bourdieu, “Espace social et genèse des ‘classes’”, i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52-53 (juin, 1984), p. 3.

② P. Bourdieu,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4, p. 28.

③ P. Bourdieu, “Espace social et genèse des ‘classe’”, pp. 9-10.

④ 转引自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刘北成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第89-90页。

系中的一个地位确定的，也是由阶级习性确定的，阶级习性‘通常’（也就是通过一种强大的统计学概率）与这个地位相关。”（*Distinction*：434）作为习性的判断力，趣味是阶级构建的重要指标，它“最终是被纳入习性的最深处的直接赞同，对喜欢与厌恶、同情与反感、幻觉与憎恨的赞同，而且它比公开的观点更能在无意识中建立一个阶级的统一性”（*Distinction*：83）。

为了把理论阶级变成行动阶级，建立一个捍卫其利益的阶级，布尔迪厄必须以习性的生产条件一致为前提，构建位置和配置同质的阶级“从条件、影响进而配置的同源性中得出作为阶级的统一化群体的存在，而这种同源性源于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一致性。”<sup>①</sup>也就是说，条件与习性的结合构成了分类与阶级的基础“条件与习性之间的辩证法是一种炼金术的基础，这种炼金术将资本分配即一种力量关系的平衡变成被觉察的差别、区分的属性的系统，也就是变成象征资本即合法资本的分配。”（*Distinction*：192）在《区分》中，1960-1970年代的法国社会被分为以不同的实践和行为举止为基础的三种生活风格，与这三种风格对应的趣味分别是统治阶级的区分意识、中小资产阶级的“良好文化意愿”和民众阶级的“必然选择”。趣味使人把自身与他人区分开来，把对象（人和物）区分开来，把这些对象分成等级。趣味成为阶级差别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在美与丑、优雅与粗俗之间进行的区分彼此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Distinction*：VI）这种区分是无意识的，比如小资产阶级喜欢严谨、整洁、简朴和仔细，并不是有意识地与民众保持距离，却暗含着对词或物上的肮脏、对贪食或对短视的厌恶；资产阶级对自如或低调、对超脱或无关利害的要求，本身就暗含着对“狭隘的”、“没文化的”或“学究气的”小资产阶级的“进取”的否认。那么，如何看待与高等阶级认同并与低等阶级区分的有意识策略呢？布尔迪厄认为这“不过通过有意识地强化，为稀有与普通、新鲜与过时的辩证法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充分的有效性”（*Distinction*：274）。

为了构建阶级，布尔迪厄设定了一个社会空间“社会空间被构成它的位置之间的相互排斥或区分确定为社会位置的并列结构（人们将会看到，这些社会位置本身被确定为不同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位置）。社会行动者，还有被他们占有进而构成财产的物，都处于社会空间的一个地点，一个明确的、特殊的地

---

<sup>①</sup> P. Bourdieu,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 action*, p. 27.

点，这个地点的特征可以被它相对于其他地点占据的相对位置（上、下、之间等）和将它与它们分开的距离描绘出来。”<sup>①</sup>这个空间是结构的，因为按照关系思想方式，行动者或阶级的实践、财产处于互相联系、互相对立的关系网中；这个空间也是历史的，因为行动者或阶级的属性受到资本总量及其结构的变化影响，是相对的，而非固有的和不变的。行动者每时每刻都在为了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类型或最有利的资本转换率而斗争，阶级关系不仅是区分性属性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且是产生属性分布的权力关系和夺取权力的斗争关系。所以，布尔迪厄既反对马克斯·韦伯的继承者（通过经验分类）以个体的属性确定阶级或阶层，把阶级固化为等级化的阶层，也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家，他们都以静止的观点看待阶级，把阶级属性看作是固有的。可以看出，这是反实质主义的、反个人主义的和反主体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为了在永久斗争的空间中抽出阶级关系的结构，布尔迪厄通过共时切割来设定阶级斗争场的一种临时恒定状态，考察个人在调查时刻投入到斗争中的不同类型的资本的分布。由此，特定阶级属性的分布是从前斗争的成果和以后斗争的资本在一个固定时刻的总结，表现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状况。

通过经验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布尔迪厄构建了1960-1970年代的法国社会空间及其阶级分布。这个空间由三个基本维度，即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和这两个属性随时间的变化来确定。资本总量区分阶级，资本结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同比例）区分阶级内部的阶层。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从都最富有的阶级到都最贫乏的阶级分布。从资本总量看，在阶级之间，大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大学教授（资产阶级）与工人（民众阶级）对立，中小资产阶级处在中间位置。从资本结构看，在资产阶级内部，文化资本多于经济资本的大学教授与经济资本多于文化资本的大企业主对立，自由职业者处于中间位置；在中小资产阶级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比例差别不明显，民众阶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很匮乏。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了社会轨迹。通过社会轨迹包含的时间机制，布尔迪厄引入了社会动力学分析。社会轨迹“通过时间意向，支配对在社会世界中占据的位置的认识以及与这个位置的有魔力的或幻灭的关系”（*Distinction*：529）。社会轨迹决定了行动者趋向于未来、新事物、运动、革新、进步，还是倾向于过去、社会怨恨和保守主义。阶级既由行动者在

---

<sup>①</sup> 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6-157页。

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决定，也由其位置意识（sens）决定。位置意识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意识（conscience），毋宁说是阶级无意识，行动者把社会世界看成是自然而然的，默认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以其他可能性与之对抗“因为配置使得被统治者以统治者的观点看待统治者和他们自身”<sup>①</sup>，参与了对自己的统治。所以，统治越来越不通过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实现，而是通过温和地施加表象方式也就是象征暴力实现。<sup>②</sup>

阶级差别本来就存在于继承顺序中，被统治者只要承认统治者的赌注的合法性，阶级斗争就表现为再生产的斗争，不一定威胁法定秩序“被统治阶级只要且只需要以分散的顺序，也就是说通过作用和反作用进入斗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就能够在一种竞争的斗争中并通过它实现。”（*Distinction*：184）。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空间也是力量场，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也是力量关系，每个进入场的人都受到力量的作用，但阶级斗争无法表现为行动者个人的意愿或行动者之间的直接互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的直接斗争。若不存在阶级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否意味着被统治者毫无行动能力呢？布尔迪厄强调，由于社会空间包含着一部分不确定性，无论行动者受到位置的必然限制多么大，他总有一种自由余地，尤其在危机时刻，他能够利用这种余地采取策略，颠覆所有机会和收益的法定分配。也就是说，习性的实践意识能够促使行动者摆脱世界的结构束缚，建立新秩序。所以，依旧是基于习性的相似性，行动者被真正聚集、发动起来，变成真正的行动者。也就是说，单纯意识和意志，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还是萨特的理智化的“觉悟”，都无法战胜象征暴力“由于象征暴力的基础不仅处于需要澄清的被蒙蔽的意识中，而且处于适合统治结构并产生于统治结构的配置之中，我们只能从配置产生的社会条件的一种根本改变中，期待象征统治的受害者与统治者的同谋关系的中止。”<sup>③</sup>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场在社会空间中牢牢占据统治地位，但文化教育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生产和消费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赶超物质生产。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详细阐述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场的形成，表明在马克思的时代也不只存在着单一的经

①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② 按照博尔坦斯基的观点，在法国1968年5月风暴之后，“资本主义新精神”吸收社会批判的成果，顺应自主化、自我管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要求，制造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新话语，发展出更有效、更隐蔽的新剥削形式（就业零工化、去工会化、消除社会职业分类等）（详见博尔坦斯基、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③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第59-60页。

济生产场。布尔迪厄有理由考虑行动者在文化生产关系中占据的位置以及文化资本在阶级和阶层划分中的作用。他逐用了韦伯的超凡魅力经济, 阐明文化生产的特定逻辑, 以韦伯的观念力补充马克思的生产力。在文化生产场中, 文化产品通过提供区分的利益得到生产、再生产和流通, 这是由文化产品的稀有性和对它们价值的信仰决定的。不同的文化生产企业, 按照它们在场中的位置, 提供客观上有差别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意义和价值符合权力场中同源位置的占据者(消费者)的期待。

布尔迪厄确立了这场中两极之间的对立: 一边是纯粹生产, 是为其同行也就是为场本身或为这个场的最自主部分生产的作家(或艺术家), 他们在世俗上处于被统治地位, 象征上居统治地位; 另一边是大生产, 是为公众和为权力场的统治区域进行生产的人。纯粹生产从长远来看, 只承认自身的需求, 以象征资本的积累为目标, 象征资本经历了从不被承认到被承认并合法化的过程, 变成了真正的“经济”资本, 最终能够提供“经济”利益。象征资本由此构成普遍的实践经济也就是物质和非物质财产经济的运行条件。由此, 布尔迪厄得出文化生产场的规则“对无关利害的崇拜是一个奇妙的颠倒的原则, 这个原则把穷困变成被拒绝的财富, 因而变成精神财富。”<sup>①</sup> 也就是说, 物质财富的(暂时)匮乏能够通过象征资本的积累导向真正的经济财富。文化生产场中自主的作家和艺术家(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 他们与社会空间中经济和文化上的被统治者利害一致, 能够用他们的表述能力为民众服务, 反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文化生产者能够利用他们尤其在危机时期的生产能力赋予他们的权力, 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对社会世界的一种系统的和批判的表象, 以动员被统治者的潜在力量并促使其颠覆权力场中的法定秩序。”<sup>②</sup> 由此, 如同马克思的物质生产, 文化生产也有其革命的逻辑和批判的逻辑。

作为布尔迪厄文化批判的启发者和同路人, 法兰克福学派揭露发达工业社会是新型的集权主义社会, 压制批判和抗议逻辑, 把人变成无法进行否定性思维的单向度的人。他们强调, 生产机制及其商品和服务将这个社会制度“出售”或强加给人们, 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和操纵, 尤其文化大工业提供单一的、重复的、预制的娱乐产品, 遏制了大众(工人、雇员、农民和地位低下的中产阶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使他们在身体和灵魂上都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 只能固

<sup>①</sup>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刘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 第35页。

<sup>②</sup>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第300页。



守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sup>①</sup> 被物化和异化的人难以打破受压迫的恶性循环，他们的解放前景非常黯淡。“因为被管理的个人已经把他们受到的残害内化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满足中，因而又在一个扩大了的范围再生产着它。”<sup>②</sup> 法兰克福学派与布尔迪厄的差别在于它着重从文化产品的供应角度进行批判，没有考虑大众的趣味与大工业产品的无意识配合。作为社会条件的内在化，必然趣味使大众心甘情愿地选择他们不得不选择的东西，造成了选择的宿命性。“分类系统使一个人拥有他热爱的，因为他热爱他拥有的，也就是说热爱他在分配中实际上被给予的和在分类中被合法地规定的属性。”（*Distinction*：195）霍克海默也用到了“内化”一词，但他期待意识哲学的“谋划”能够实现否定的自由并抓住“替代性选择的机会”。<sup>③</sup> 而对布尔迪厄而言，被统治阶级有可能通过习性而非政治觉悟被动员起来获得解放。

与马克思的生产至上不同，布尔迪厄强调，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建立在信用、消费、享乐基础上的享乐主义的消费伦理，取代了建立在节制、节俭、节约、算计基础上的苦行主义的生产和积累伦理。“一个阶级既由它的被感知的存在也由它的存在确定，既由它的消费——这种消费不需要成为炫耀性的就可成为象征性的——也由它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确定（即便后者的确支配前者）。”（*Distinction*：564）。体现在消费中的趣味也成为构建阶级的标准。无疑，消费首先是由经济资本决定的。民众阶级满足于生活必需品及其实用功能，要求整洁和舒适，而已经脱离生活急需的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精心布置的室内环境或时髦的和别出心裁的衣服。统治阶级则通过购买奢侈品和无价艺术品显示自己的高贵。但布尔迪厄在调查中看到，经济资本不能充分解释高雅体育运动（高尔夫、滑雪、快艇、马术和网球等）在阶级之间的分布，比如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或高等阶级的暴发户，由于缺乏家庭传统和早期训练、仪表和社交技巧，通常不选择属于老牌资产阶级的高雅运动，因为占有一件有品质的物品不只需要经济资本，也需要文化资本和习性。

经济理论只看到单个消费者和单个产品，把消费者等同于其购买力（即收入），把产品简化为单义的技术产品，忽略了趣味的作用。凡勃伦也持这种经济决定论，在他看来，不是审美禀赋方面的天生差别，而是荣誉准则为某个阶级的

---

① 详见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149页。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③ 详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73-175页。

消费者指定了产品或艺术品的消费,使他的消费不能损害身份,这种荣誉准则是严格地由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决定的。<sup>①</sup>实际上,是趣味而非收入支配客观上符合收入的消费,迫使人们选择符合自身客观条件的产品“趣味是让物与人相配和近似的东西,物与人彼此融洽,互相适应。”(*Distinction*: 268)行动者通过选择符合自己趣味的产品,为自己分类。所以商品不只是马克思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或法权关系的一般产品,停留在物质和经济生产的范围内,还是一种客观话语系统。

消费品除了使用价值,还有象征价值和区分价值“财产一旦从关系上被认识,就变成了区分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高雅符号,但也可能是庸俗符号。”(*Distinction*: 564)也就是说,物品被消费的不只是其物质性,还有其差异“具备最大的区分能力的物品是那些最能证明占有的品质进而最能证明物主的素质的物品。”(*Distinction*: 320)购买无价艺术品是财富和趣味的最佳证明。由此,艺术品既是纯粹审美的对象和静观的对象,也是物质的或象征的专门占有的对象,它们作为文化资本起作用,提供区分的利益和合法性的利益,资本越稀缺,带来的区分利益越大。

所以,资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根本不是凡勃伦所说的有意浪费,它既是经济实力的标志,也是积累象征资本的优良投资,是向所有停留在基本生活需要的人的挑战。消费过程中呈现的,与其说是消费差别,不如说是生活特权、政治特权和文化特权。归根结底,这是以自然“区分”、个人“修养”的形式占有区分符号和权力标志。通过消费,布尔迪厄再次证明趣味如何通过归并不同种类的资本并内化社会结构,成为阶级划分的必要标准。

与布尔迪厄保留消费的物质基础不同,鲍德里亚则直接把马克思的生产社会置换为消费社会,把商品的符号特征绝对化。他沿用了马克思的商品逻辑,认为欲望、要求、激情和关系都通过抽象化和物质化变为消费品,变为可随意选择的等级化物品,群体在物的组合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消费由此是“一种完全唯心的、系统性的作为,它大大地溢出[人]与物品的关系和个人间的关系,延展到历史、传播和文化的的所有层面”;“消费物因此正是计划在其中‘自甘消解’之物……生命计划本身,切成片段片段、不被满足、[只]被指涉,便在接连而来的物品中,一再重新开始又再消解”<sup>②</sup>。这就是说,鲍德里亚把消费看作自我

① 详见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7页。

② 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6、227页。

在物中的投射，看作在广义文化系统内无限循环的自我生成、自我消解的碎片化的纯粹符号行为，这样就消除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性。应该说，鲍德里亚对于物的阶级划分作用，满足于随笔式的现象学描述，脱胎于巴尔特拓扑学式的符号学“物体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的印记”，“占有性基本上依赖于对事物的划分：去占有就是去分隔世界，按照非连续性本身的比例把屈从于人的世界分成诸有限的物件”<sup>①</sup>。两者都无视为了占有区分符号或规定分类原则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区分所产生的象征暴力。所以，布尔迪厄有理由说鲍德里亚的社会学是“装扮成现象学—逻辑学—符号学的分析的一种投射式检验的记录”（*Distinction*：84）。

通过趣味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以分类斗争的形式扩展到象征斗争的领域。象征斗争是为了争夺象征权力，社会世界中属于信仰、认识和评价、认识和认可之范畴内的一切，如名声、威信、荣誉、功绩、权威。象征权力只要被认可，就成了合法权力并能掩盖其暴力基础，将象征暴力添加到基础暴力中。

阶级斗争不再采取早期工业社会中的激烈对抗形式，而表现为温和的社会分类斗争。分类斗争由此是阶级斗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因为“个人的或集体的分类斗争，力求改变关于社会世界的认识和评价范畴，并由此改变社会世界”（*Distinction*：564）。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与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观念和区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行动者把认识结构用于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世界，从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出发来建构社会现实，进行着以推行自己的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他们的观点和利益是由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因此，布尔迪厄对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有重要的认识论功能和政治功能“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群体的最深层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sup>②</sup>他通过对社会关系的科学分析揭露了统治策略，为被统治者提供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手段，延续了马克思—萨特的批判传统，为思考异化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建立在社会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基础上。为了构建科学对象，布尔迪厄主张从经验研究出发，建立一个连贯统一的关系系统，实现普遍化的意图。他甚至把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经验也

---

① 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0、82页。

②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页，此处译文笔者根据原文有改动。

投入到研究中,对自我实行了客观化“我不断地把自己当作对象,但不是在一一种自恋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个等级的代表。”<sup>①</sup>同时他称自己无意建立一种元理论“我从未要求自己生产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一般性话语,更不用说生产一种以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为分析对象的普遍性元话语。”<sup>②</sup>《区分》出版三十多年后,在“文化折中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文化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作者基于法国1960-1970年代的社会历史现实提出的理论有没有过时,其阐释模式能否经得起趣味变化的考验?后来的社会学家或主张以文化杂食主义/文化单食主义的对立取代布尔迪厄的文化合法性论断,或质疑布尔迪厄的理论模式的普适性。<sup>③</sup>他们的思考都受益于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伟大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引发研究者的长久争论和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毋庸置疑,布尔迪厄的关系思想方式,对趣味的社会逻辑的分析,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和动力以及文化生产场的分析,并未丧失它们作为社会学研究式的活力。

[作者简介] 刘晖,女,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文化理论等。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布尔迪厄的思想谱系——布尔迪厄生成结构理论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6期)、《异端马奈的生成——论〈马奈:象征革命〉》(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3期),译著有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商务印书馆,2015年)等。

责任编辑:张锦

---

① P. Bourdieu avec L. J. D. Waquant, *Réponse... Pour une anthropologie réflexiv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2, p. 175.

② 布尔迪厄和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③ See P. Coulangeon et J. Duval, dir., *Trente ans après La Distinction*,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3, p. 20, p. 113.